

《共产党宣言》序言的理论价值及其方法论启示

郑召利 王瀚浥

摘要 长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 7 篇序言多被视为附属性文本,掩盖了其本身的理论价值。立足文本进行整体考察,序言丰富拓展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凝练表达出《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序言随历史变迁不断敞开自身,深入反思了欧洲革命,从原则上指出不同国家依据自身现状选择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决定性地阐明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特征的具体化原则。唯有将《共产党宣言》与序言作为一个整体,坚持《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与历史实践相结合,才能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巨大理论价值及其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实践;具体化原则

中图分类号 A121;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2-0053-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710003)

1920 年,陈望道先生翻译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首部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随着历史形势的改变,诞生于 170 多年前的《宣言》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不能对当下人类社会面临的所有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但是“其阐述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1],依然对当下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参考和原则指导。在陈译本发行 100 周年的当下,重读《宣言》这一经典文本,把握《宣言》的当代价值,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宣言》序言^①,理解序言阐述的基本原理及其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序言共有 7 篇,其中不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 1872 年德文版序言和 1882 年俄文版序言,也包括由恩格斯单独署名的 1883 年德文版序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以及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本文通过考察序言对《宣言》写作缘起的分析、对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反思以及对资本主义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后未来革命发展道路的探讨,重新思考序言文本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容易被低估的《共产党宣言》序言

《宣言》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有“红色中华第一书”与“中共第一经”之称,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以及革命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序言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变迁不断更新的理论文本,深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具体化的实践路径。然而,作为《宣言》的重要一环,序言的译介和传播与《宣言》本身并不同步。1920 年出版发行的陈译本《宣言》仅包括四章正文,缺少序言和注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整译本。随着 1930 年华岗版本的发行,三个德文版序言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1943 年博古译本的《宣言》,使俄文版序言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1949 年,中国解放社翻译了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发行的《宣言》百年纪念版,首次收录了马克思恩

^① 文中《宣言》特指不包括 7 篇序言在内的四章正文及其注释部分,序言则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全部 7 篇序言,对其作整体性说明,而非特指某篇序言。如有特指某篇序言,则会标注为“1872 年德文版序言”“波兰文版序言”“1882 年序言”等字样。

格斯撰写的7篇序言。自此,囊括全部序言和四章正文在内的完整版《宣言》在中国公开问世。就时间发展而言,7篇序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比《宣言》迟了约30年之久。

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序言不仅在译介传播方面晚于《宣言》,而且在理论研究的被关注度上也逊于《宣言》。目前学界对序言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对序言译介传播的考证。张亮等学者清晰展示了《宣言》及序言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依据《宣言》在中国的出版历程梳理了序言出现的先后次序^[2](P65-134);杨哲细致梳理了序言在中国由只言片语的摘译到逐篇翻译再到全文收录编译的过程^[3](P51-57);田子渝着重对陈译本《宣言》进行考察,指明陈译本中序言的缺乏,并详细考证了译本的主持者、出版社等细节问题^[4](P117-123)。

二是针对个别序言所做的具体分析。王小燕从1872年德文版序言入手,根据马克思在同时期的相关著作以及社会运动的实践经验,指明序言中的“过时”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否定,也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5](P143-152);钟哲明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与正文第一章内容相结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两个不可避免”提出的必然性^[6](P4-12);王建礼重点关注1883年德文版序言,指出恩格斯对《宣言》思想的丰富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发展^[7](P33-38);宋泽滨指出,马克思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作为落后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积极回应,对中国道路实践具有借鉴意义^[8](P11-16)。

三是对序言作整体性把握。以艾四林为代表的学者概括了7篇序言的主要内容,认为序言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9](P26-31);高放指出,序言不仅明确了《宣言》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也体现出对《宣言》原则的实际运用,并将7篇序言比作开启研究《宣言》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7把钥匙^[10](P11-16);袁小云等学者着重强调了序言对《宣言》发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考察,指出开放性和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特征^[11](P25-29)。在此基础上,刘明华将序言与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指出马克思没有将目光囿于以英法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扩展到全球范围,关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及落后东方国家的道路选择问题^[12](P5-8)。

针对序言研究而取得的丰富成果,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和体悟序言的重要意义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对序言的研究并未充分全面地展开,主要集中于序言与《宣言》文本的关系问题,或是探讨马克思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或是将序言视为对《宣言》的概述、说明和补充,梳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都有意无意地将序言置于附属地位,忽略了它本身蕴含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笔者认为,只有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同时期撰写的相关著作,在考察历史现实运动的基础上,整体把握序言对《宣言》一般原理在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实际运用,才能真正阐明序言所展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内在蕴含的方法论原则。

二、《共产党宣言》序言的理论价值

随着《宣言》的不断再版,在20余年间马克思恩格斯为之撰写了7篇序言,时间跨度非常大。1893年的意大利文版序言距离《宣言》发表已约半世纪之久。在此期间,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71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等革命运动相继爆发,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考虑到以上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萌发了依据不同国家发展状况起草序言的想法,借此阐明《宣言》与发展变化的历史时代之间的关系。

首先,序言详细阐明了《宣言》文本的思想归属和写作主体问题,补充丰富了《宣言》的基本内容。按照文体学的诠释,序言多是放在著作正文之前,用来说明写作意图、基本内容、学术价值及译者介绍等内容。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开篇,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因受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奉命为这一“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起草撰写“理论和实践的党纲”^[13](P376)。在明确写作目的的基础上,序言概述了《宣言》的发行和再版情况。除1883年德文版序言外,其他6篇序言

均涉及《宣言》在欧洲的译介传播。大体而言,《宣言》历经了大卫·哈维所谓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转移”,从德、法、英等西欧国家逐渐转向波兰、俄国等东欧国家再到美国等其他国家,在全世界流传扩散。1888年英文版序言指出,《宣言》的传播状况不仅反映了所及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也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标杆,是“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13](P394)。随着工业发展程度的提高,工人阶级愈发想要认清自身的生存状况,其理论需求与社会运动也随之增多。另外,序言进一步明确了《宣言》的理论归属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关系问题。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单独撰写的1883年德文版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虽然《宣言》是二人合作完成,但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13](P385)。在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度表明,早在1845年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会面时,马克思已经把这一思想考虑成熟,并且几乎用“明晰的语句”^[13](P380)加以阐明了。

其次,序言明确解释了《宣言》何以被称作“共产主义宣言”的缘由,进一步充实了马克思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在《宣言》第三章,马克思恩格斯对不同类别的社会主义(如反动的、保守的以及批判的社会主义等)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要么沉溺于对过去和未来的幻想,要么企图通过各种改良手段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宣言》虽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但缺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详细阐述,未指明二者的本质区别。1888年英文版序言将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分为两类:一是批判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将共产主义社会看做个人活动的必然结果;二是反动的和保守的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各种补缀方式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与之相比,只有工人阶级表明了唯有从根本上解放所有人才能够解放部分人的坚定决心。如果社会仅通过资产阶级发动“社会主义运动”,而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注定无法实现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一根本任务。通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比,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才是“工人阶级的运动”^[13](P385)。在廓清二者本质差异的基础上,1888年的序言进一步表明,虽然当时的共产主义处在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状态,但它“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13](P385),着手联合工人阶级反对阶级压迫,将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实现共产主义视为最终目标。由此看来,序言通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概念内涵以及阶级立场方面的阐述,用共产主义为该著作命名,充分反映出共产主义宣言所蕴含的理论旨趣与现实价值,对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关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诠释有重要参考价值。

再者,序言凝练概括了《宣言》的基本原理与核心思想,澄明并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重要根基。1883年德文版序言对《宣言》的基本思想进行了三重解读:第一,立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13](P380),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第二,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进行总结,指出自氏族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将阶级斗争视为摆脱资产阶级剥削的重要手段;第三,指明现今这个斗争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13](P380),如果无产阶级不使整个社会得以解放,就不能解放自身。1888年英文版序言引用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宣言》思想的概述,同时强调了首版德文版序言中社会局势的变化。1882年俄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明确指出《宣言》的根本任务,力图通过革命斗争“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3](P389)。由上述论证可知,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以及1890年德文版序言,均对《宣言》的核心思想和最终目标进行强调,表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以及运用该思想对社会进步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方向等主题的探究。序言对《宣言》基本原理的提炼,不仅强调和佐证了《宣言》这一历史文本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核心表达,而且从历史规律的高度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宣言》的理论厚度。

左尔格曾在1872年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海耳曼·迈耶尔翻译的《宣言》英译本,马克思也答应对此作必要的补充,但最终在1876年致他的回信中明确写到,“我们想着手审阅《共产党宣言》,但作

补充的时机还不成熟”^[14](P169)。由此来看,序言虽然是因《宣言》在不同国家出版所作,但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未经思考草率完成的“序”。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序言的态度极为严谨审慎,他们以社会现实的演变以及理论的发展状况为参照,决定是否对《宣言》撰写新的序言。因此,序言并不停留于对《宣言》写作的社会背景、思想主体和出版发行状况的明确,而是依托具体革命实践与时代发展状况,对《宣言》的核心思想和一般原理进行高度凝练,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对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三、序言立足革命实践对《共产党宣言》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

序言对《宣言》的承继、创新和发展,对《宣言》一般原理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倏忽之间的想法,而是历经时代检验澄思渺虑的理论结晶。序言对社会现实始终保持敞开状态,不仅阐述了《宣言》发表以来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总结了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历史经验,而且将其视阈扩展到东方世界,从原则上指明了革命运动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方向及其通向共产主义的新的可能性。

序言通过对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巴黎公社革命等运动的深入性反思,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思想。《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要使自身成为统治阶级,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国家政权,但对掌权后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用何种方式对其进行取代等问题没有进行具体说明。历经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马克思在《1840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及1852年写给魏德迈的信中先后两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但受困于当时的认识程度和现实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未对其进行详细阐述。1848年2月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后,马克思意识到,这一变革“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13](P761)。经过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马克思在1872年序言中进一步明晰,无产阶级“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13](P377)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15](P642);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掌权的首要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15](P642)。在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前提下,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掌握国家政权,解放社会继而解放自身。从未提及何以对待国家机器到摧毁、破坏再到彻底打碎,马克思在序言中对待国家机器态度的变化,是历经社会实践后对《宣言》思想的重大推进和完善。列宁十分重视这一转变,将其视为对《宣言》“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16](P142),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16](P134)。

通过对《宣言》发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变革的论述,序言反映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我扩张趋势以及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展现出其丰富性。自地理大发现时代起,资产阶级为拓展商品市场,获取增殖利润,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流动,到处“落户”“开发”“建立联系”^[13](P404),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各国之间孤立封闭的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3](P194)。1882年序言详细分析了以美国、俄国为代表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国家的社会变化。早在1847年,俄国和美国都只是欧洲国家的原料供应国和产品出口国,为其提供外部支撑。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情况已经“完全不同”^[13](P378)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多使美国工农业迅猛发展,不仅撼动了欧洲封建所有制的基础,冲击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也使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当时被称为“反动势力”代表的俄国,也由于资本主义狂热势力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了“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13](P379)。概言之,序言阐述了《宣言》发表以来后发国家对原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序言对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论述,对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描绘,并不是基于“‘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13](P169)等抽象思想,而是以交往和分工为基础,依托现实历史性活动的科学论断。

在分析欧洲革命形势和社会变化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展开追问,指出不同国家依据自身现状选择革命道路的可能性。恩格斯在 1892 年波兰文版和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论证了欧洲国家民族独立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两国大工业发展境况的考察,指出资产阶级最终会发展成为“它自身的掘墓人”^[13](P397),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道路。在此维度上,实现民族独立,壮大资产阶级队伍,对实现无产阶级工人大联合具有重要意义。《宣言》虽然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那么“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3](P419),但并未将阶级解放与民族独立问题结合起来。恩格斯在总结波兰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唯有依靠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才能实现波兰的独立,其他欧洲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般渴望波兰的独立。换言之,波兰的独立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13](P395)的重要基础。在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度重申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关联性,指出其不仅可以夯实工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也为各民族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条件。序言虽然主要围绕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展开论述,但对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工人联合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相关理论正是对该思想的延伸和拓展。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局限于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而是将视阈扩展到落后的东方国家,在 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面回应了俄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宣言》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力量,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3](P404),“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P405)。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的世界性意义,马克思此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率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进行。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担任欧洲通讯记者期间,马克思也曾多次就印度、中国等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评论,指出印度存在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17](P148)极具“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17](P149),使人屈服于环境并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没有“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7](P148)。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随着对人类学、考古学等材料的不断占有,马克思对东方国家的论断也更为清晰准确。他指出,西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果我们固守“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么将永远不可能通达真理,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8](P131)。

1881 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进一步表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仅针对西欧国家,《资本论》中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论断对俄国并不具有实质意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 1882 年俄文版序言中继续对俄国的社会状况进行分析,针对“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这一社会事实,指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的新生支点。“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P379),不经过西欧国家经历的“瓦解过程”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13](P379)。将 1882 年俄文版序言对俄国现状的分析置于马克思恩格斯整体思想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按照《宣言》中研究西欧国家的一般历史规律去分析俄国问题,也没有坚持共产主义必定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这一既有研究结论,而是在切实考察俄国原始土地公共形式及农村公社发展的前提下,在对该国社会发展状况和独特国情进行具体把握的基础上,指明了俄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一论述不仅展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探究世界国家发展的原则高度,也体现出他们结合现实具体分析革命道路的实践特质,对俄国及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四、序言的方法论启示: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

上文在一定意义上澄清了序言对《宣言》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意义,但如果我们停留于此而不继续追问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序言的全部理论基础,那么对序言的研究就其根本而言依然是晦而不明的。对此,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阐明,序言的撰写对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具有的本质意义。

要把握序言运用《宣言》核心原理所体现的方法论意义,必须证明其存在论基础,指明序言在何种意义上贯彻了具体化原则。马克思早在其新世界观的萌芽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具体现实的重要所在。对他而言,社会现实并非直接给予的现成的东西,而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全部社会关系。“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3](P153)。只有在充分把握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历史演进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研究,都必须从实在和具体出发,立足“现实的前提”^[19](P37),把握社会这一既定主体,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道路。其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生产一般”作为“一个合理的抽象”,阐述了生产在其存在时代的共同特征;另一方面,这个由共同特征所组成的一般,本身就是由许多“不同规定的”“组成部分”^[19](P22)构成的;更重要的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作为“本质的差别”^[19](P22),作为立足社会现实的具体,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脱离社会现实被先验规定的忽略差别的一般,就其存在本身而言并无特别的意义。而正是包含了一般的差别,指明了立足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

在切实把握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具体化原则逐渐展开其内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0](P2)。有学者指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应被“理解为并且称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路径”^[21](P283)。具体化原则不是“现成的”“自身封闭的”^[21](P284),而是立足现实不断敞开自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它提供的不是普适性的永恒真理,而是指导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指南,是经由具体现实理解历史发展的原则。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和贯彻该原则,那么序言所提供的方法论意义甚至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将会陷入崩溃瓦解的境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表示,《宣言》将对历史学产生“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13](P385-386)。这里的作用绝非停留于经验科学意义上对进化论这一真理性结论的掌握,而是正如进化论给当时社会带来的颠覆性革命一般,序言阐述的基本原理以及其内在蕴含的方法论对当时泛滥的抽象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正是这一具体化的实践原则,为澄清与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起到重大作用。

正如马克思不否认“生产一般”一样,马克思也不否认《宣言》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意义。如果说《宣言》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阐明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一般原则性,那么序言在资本主义何以过渡到下一环节的问题上,则体现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差别的灵活性。就序言来说,它本身就是马克思深入贯彻《宣言》基本思想,依托具体历史进程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成果。无论是对无产阶级打碎国家机器的强调,还是对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论述,抑或是对无产阶级运动与民族独立关系的阐释,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结合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P376),在实践运动中不断与时俱进、探索创新的结果。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坦率指出,《宣言》的“某些地方”可以作“一些修改”^[13](P376):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十条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在今天会有“不同的写法”^[13](P377);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及革命活动的兴起,《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论述与当下现状并不相符;有关共产党人对待各反对党派态度的相关论述也由于“政治形势”的“完全改变”,其“实际运用”“已经过时”^[13](P377)。由此来

看,《宣言》对西欧各国革命形势的分析仅具有暂时性意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工人运动的变化,必须立足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对相关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但由于《宣言》是“历史文件”,“没有权利”对其“加以修改”^[13](P377),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撰写序言,弥补其历史局限性。在此维度上,序言的撰写鲜明展示了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是连接《宣言》这一历史文本与当下时代发展的阶梯,对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变化了的时代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序言对《宣言》基本原理的贯彻和发展,不仅突出了《宣言》的当代价值,也要求人们在领会《宣言》时把握其内在规定的具体化原则及方法论意义。事实上,序言的撰写本身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人的告诫:《宣言》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经由历史发展不断丰富的理论,是立足当下有待不断解读的思想。恩格斯在致劳·拉法格的信中写到,如果不指出《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那无论以何种语言出版都是不行的。不阐明这点,“第二章末尾以及第三章整章和第四章整章就完全不可理解”^[22](P372);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性思想和具体化原则不仅是序言的重要规定,而且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它绝不是脱离历史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是扎根社会现实与历史实践对特定社会中生产生活方式具体展开的科学抽象,“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3](P153)。在安·拉布里奥拉看来,由于《宣言》具有“那种刚刚诞生而且还未脱离其诞生土壤的事物所具有的全部真实而又原始的力量”,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没有一本能代替《宣言》,也没有一本能起《宣言》的那种特殊作用”^[23](P7)。换言之,因为《宣言》扎根于社会现实这一土壤,立足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其基本内涵,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序言则是这一原则的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还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因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和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立足社会实践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明确了何以在社会现实的展开过程中把握历史运动的方法论原则。

解读《宣言》时,将序言和《宣言》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不仅要从根本上理解《宣言》的基本思想和一般原理,更要注意序言依据世界历史演进对《宣言》的丰富和发展,领会序言蕴含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24]。如果不顾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不假思索地将马克思在特定时期针对既定社会提出的具体措施奉为永恒真理,就会脱离社会实际,甚至产生失误;盲目以主观臆断的实用性为评判标准,将有用的奉为真理,无用的视为谬误,会忽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对其理解产生差池。当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更要结合具体的社会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创新。只有将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与依据社会发展的具体历程结合起来,才能切实把握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巨大理论价值,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意蕴,并以此为理论武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求是, 2019, (22).
- [2] 张亮, 乔茂林. 《共产党宣言》传播史.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 [3] 杨哲. 《共产党宣言》序言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对序言译介史的考察. 教学与研究, 2017, (2).
- [4] 田子渝. 陈译本《共产党宣言》与《宣言》序言传播的研究. 中共创建史研究, 2019.
- [5] 王小燕. 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的“过时”.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 (1).
- [6] 钟哲明. 《共产党宣言》论资本主义及其两个“不可避免”——《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及1872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研读.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1, (1).
- [7] 王建礼.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研究——兼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相关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4).
- [8] 宋泽滨, 齐爱兰.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 (3).
- [9] 艾四林, 曲俊杰. 《共产党宣言》导读.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 [10] 高放. 开启真理宝库的7把金钥匙——研读《共产党宣言》感悟7篇序言.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0, (5).
- [11] 袁小云. 从《共产党宣言》序言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 思想教育研究, 2016, (10).
- [12] 刘明华. 《共产党宣言》序言全球化思想的三重视域. 社会主义研究, 2010, (5).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16] 列宁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1] 吴晓明. 超感性世界的神化学及其末路——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当代阐释.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6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23] 安·拉布里奥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杨启澍、孙魁、朱中龙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24]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05-19.

Theoretical Values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refaces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Zheng Zhaoli, Wang Hanyi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even prefaces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ritten by Marx and Engels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uxiliary texts, which covered up their own theoretical values. On the basis of an overview of the whole text, the prefaces have enriched and expanded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oncisely expressing its core concepts and defending the basic stand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re importantly, keeping open to historical changes, the prefaces have provided an in-depth reflection of European Revolution and have in principle pointed 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revolutionary road given the status quo of different countries, decisively clarifying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concretization. Only by taking the prefaces and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s a whole and by combining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nd historical practices together can we truly grasp the theoretical values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ism in the modern era.

Key words prefaces of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practice; principle of concretization

■ 收稿日期 2020-12-08

■ 作者简介 郑召利, 哲学博士,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
王瀚浔,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 涂文迁